萧公权初版于1940年的这本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已是不可磨灭的经典巨著。笔者不认为共和国建立以后，大陆学界还能够写出相同分量的学术作品，更不要说超越了，正如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一样。本书煌煌千页，上自孔子下迄孙中山，必成今后不可或缺之工具书。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博，这里自不能，亦无力做一全面之总结。只能对本书的写作，以及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做一提要式的分析，述笔者一时之感想。

作者曾受过西方政治学、哲学系统性的训练，已有现代学术极扎实之基础。同时，作为并未落入西方当时学者一般之窠臼，以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或不值一提，或完全没有。而是以为，中西之政治思想各有优劣，此为不同文化之特点，而非优劣好坏之区别。此一看法，诚为吾后人所倾仰。但不可避免的是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，作者既是学界巨擘，尚无追及并肩者，但也是开拓者，总归有未达圆熟、通透的领域。瑕不掩瑜。

既然是一全面的历史，作者当然会总结一些规律性的、概括性的特征。本书的基本框架，作者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了四个阶段：创造时期（孔子至始皇）；因袭时期（秦汉至宋元）；转变时期（明初至清末）；成熟时期（三民主义成立至今）。作者对于先秦时期的描述，大致于哲学史的研究相补充，这一前所未有的的思想蓬勃期塑造了后来出现的思想流派的雏形。

作者写道，“自秦汉以来，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，一脉相传。千余年中，虽间受攻击，而根本未能动摇。”即作者将专制之思想，视为中国秦代以来近两千年的基本特征，此或不妥，有根本性地偏差。举宋代为例，作者叙述宋代政治思想学派，分为四大部分，一是李觏、王安石为代表的功利主义，一是理学，一是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思想，一是苏洵、苏轼的蜀学。其中唯有司马光的政治观体现了一种专制主义的倾向，而其影响又远逊于前两者。但是，作者为了切合其结论，“专制政体之发展至宋近于完成”，“‘专制’之思想不能打破”，却要说“司马光的尊君之论最能表现时代精神”，此则大缪矣。作者仅仅引用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论据，但却把书中所写的完全相反的、也是数量更多的相反证据忽视了。作者之所以有如此严重之错误，一是受当时时代氛围所影响，未脱两千年帝制为存粹之专制的思想藩篱；二则是作者研究方式所固有的缺陷，此或亦深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，即作者专注于思想家的政治思想，而对于政治的实践研究不足，以中国学术的传统观点来说，两者实不可分离。如果从政治实践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，则“专制主义”的说法更加难以作为一全局性的本质概括。况且如作者在本书中写，思想界中反对专制者数量远甚于相反之趋势。秦政以后，中国政治实际上并没有一种单一方向的趋势可言，更多地表现为上下地波动，若要做出进一步地判断，需要结合思想史与历史，以客观、不先入为主地严谨态度做仔细地研究。

作者有时不免将西方当代政治史的一些观念当作了一种更“进步”的概念，如“民族”。在王夫之以前，中国学者论及“民族”往往以文化而非血缘作为最终判断之标准，至王夫之则始有近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政治观。作者对此表达了莫大之赞赏，体现作者无疑倾心于此，以为西方近代血缘种族之民族观更为“先进”。此或也非然，若刨根究底，似乎文化之“民族观”在气度、精神、文明程度上还要超过血缘之“民族观”，后者无疑更为偏狭。实难以用“进步与否”来判别此民族观念之是非，更适合用文化之特色来区分。民主制度为西方文化之优势与特色，可为吾国吾民所学习借鉴，此无疑矣；然以偏狭之血缘为身份归属之凭依，此或又悖于中国文化海纳百川、包容并取之进取精神。“狭义之民族观”有时有其简便之处，如满清、蒙元确以其外族之身份重创中华之文明，然必不可忽视反例之存在，正为北魏之虚心汉化，方成隋唐雄迈之气，此则民族融合之极佳案例。如此，以中国文化传统言，或以文化论民族，方为合适。

作者在写本书时，是抱着极强地民族感情来写的，国难之中，不免事事仓皇，未有充足之时间、惬意之环境写就更完善的著作。本书第五编“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——成熟时期”以“本编缺文”交代，作者原计划写的是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。但在作者后来所写的“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”中，我们能一窥其关于三民主义的评价。作者看重孙中山政治思想中“慎思明辨，集成综合之创造能力”，三民主义既能采用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，又能以西洋现代实学为借鉴，“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至先生而始成立”。笔者亦以为，中山之政治思想，确为一可行之道，融汇中西之精义，成中国文化之现代新气象。大可叹惋的是，正如作者最后只能以缺文出版，中山之理念最终亦未能来得及施行或完善，中国便又遭逢更不幸之国难，此下中国文化之命运如何，莫可测也。